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朱汉民

秦汉名物丛考

王子今◎著

Qinhan Mingwu Congkao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秦汉名物丛考

Qinhan Mingwu Congkao

王子今◎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名物丛考 / 王子今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8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ISBN 978-7-5060-8434-5

I. ①秦… II. ①王… III. ①秦汉考古—研究 IV. ①K871.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7547号

秦汉名物丛考

(QINHAN MINGWU CONGKAO)

作 者: 王子今

责任编辑: 冯文丹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434-5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本书获得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课题出版资助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
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做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

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

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存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

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

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架构、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忬、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

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序

王子今教授所著《秦汉名物丛考》一书承岳麓书院资助，即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发来书稿，嘱我为之写序。一个多月来，犹豫再三，迟迟无法动笔。就我个人的学力和见识，为子今的大作写序，实在是力所不及，难以胜任。惶恐与压力比起前几位为其写序的同龄师友来还要严重得多。不过，千钧重托，却之不恭。换个角度想，先读为快，总会有收获和教益，写一篇读后感，亦不失附骥之幸。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史如果从夏朝算起，也有四千一百多年。但是对文化古籍的全面整理，只能从孔老夫子算起。在孔子所构建的儒家文化里，重“道”而不重“器”，重思想义理的阐发，轻名物技艺的研究，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器”的研究，对具体专业技术的研究，甚至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我常作如是想，宋代以后，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导致全面的社会迟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太重空疏义理的阐发而偏废实学。

尽管如此，中华民族的汉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文字到典籍一脉相承而未曾中断的文化。要读懂中国历史，要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对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郑康成遍注群经，就包括了对其中各种名物的阐释。二十六史中对兵器、礼器、舆服、宫殿城阙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偏重名物。历代编辑的专书如《尔雅》、《释名》、张华的《博物志》、北魏刘懋的《物祖》、隋人谢昊的《物始》、明人罗颀的《物原》、清人陈元龙的《格物镜原》，以及专以名物命名的典籍，如宋人蔡

卞的《诗学名物考》、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明人耿随朝的《名物类考》等，虽内容和贡献各有高下，但都不失为历代学人关注名物研究的成就。

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名物可以万千计。即使当世人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我们日常所接触的每件物品之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这些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更何况时越几千年，地跨数万里。加之各种名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大到宫殿城池，小到一针一线，有些宏观到国家社会，有些则细碎到不被常人注意。要把它们考证清楚，没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见闻，则无以胜任。因此，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

近些年来，华夫（张述曾）先生集众人之力，历三年寒暑，编成了巨著《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于1993年出版问世，煌煌800万字，可谓嘉惠学林，功垂后世。另有王玉哲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尤其是最近孙机先生出版的同名著作，是在他早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基础上增订完成的，内容之宏博，功力之深厚，堪称古代名物研究的经典。但是，任何一种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它解决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问题，很多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汉名物丛考》就是从特定的角度，选择一些对常人而言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贡献。

首先，从全书的结构看，近30万字的著述，没有分章分节，而是以“丛考”的形式出现。我理解这个“丛”，有两重含义。一是根据研究的名物对象一组一组，也就是一丛一丛地安排。全书48组（包括两篇附文），读起来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同时也照顾到了自己研究的路径和表述的方便。48组丛考，既可单独成篇，又可浑然成一。二是每一组内，连类而及，把相关的一系列名物尽量包括进来。比如对“酱”的考证，先根据文献的记载指出，秦汉时期的“酱”，是一种用食盐腌制的肉酱。尔后对与此有关的鱼酱、蟹酱、鱼子酱以及民间食用的豆麦之酱逐一进行考证，指出桓谭《新论》中的“鄙人得鲙酱而美”的“鲙酱”，很

可能是一种鱼酱。《北堂书钞·酒食部·醢》中的“鲙鲙之酱”当是一种用乌贼或墨鱼做成的酱。同书的“蟹胥之酱”即是一种蟹酱。《礼记·内则》中的“卵酱”，当是一种鱼子酱。然而，这些鱼肉之酱在秦汉社会可能只局限于富有阶层的消费，而下层民众食用的酱更多的还是用蔬果豆麦制成。书中考证了芥酱、芍药之酱、枸酱、榆莢酱、豆酱之类广大社会民众日常作为调味品的食用之酱。考证名物的同时，还指出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木简上的“酱杞一枚”可能为“酱梔一枚”；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竹简上的“肉酱一伤”，可能为“肉酱一觔”，都应是盛装器，对简牍释读上的疑难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48组之下有250个小题目，将所涉及的210多种（据书后索引统计）具体名物根据其相互关系分隶于48组之中。

其次，考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建筑遗迹、秦汉简牍、摩崖石刻上出现的颇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名物术语。比如饮食类中的十一组（酱；豉；盐菜、酱菜；酒、麴；清酒、薄酒、浓酒；醇酒、白酒；善酒、美酒、厚酒、浓酒；膏饼；豆、黄豆、大豆；枣、棘；乳、马湏、桐马酒）大多出自汉简之中；军装服饰类中的四组（行滕；偃胫；赤帻；马甲）出自汉简的记载和汉墓的兵俑；马匹马具马食类中的五组（天马；木鐙；掌蹄；茭；苇、蒲、慈其）出自出土文物和汉简；交通道路类中的五组（阁、阁道、栈道；石藭、石道；徧、徧；𨔵；桺、笼）出自《石门颂》《西狭颂》《郾阁颂》等“三颂”石刻文字中；日常用具类中的三组（蒋席、皮席、蓆席；行囊、行橐；鹿车）亦多出自简牍；建筑设施中的四组（复壁；复道；瑯、当；封）来自建筑遗迹。胶和胶鞅一组亦出自汉简。其他十五组如儿童玩具（鸬车；竹马；泥车、瓦狗三组）、日常生活用品（甬、笛、筒；角杯、犀角杯；合盃杯；流马方囊等四组）、交通设施（虹梁；浮桥；舟船属具三组）、军事装备（连弩；机、机械两组）、海洋生物（人鱼膏；海鱼；大鱼、巨鱼三组）也都与考古文物有密切关系。对上述各类名物的解释，有些是

子今教授的首发；有些则是过去已有解释但不确切或不正确，子今对其进行了纠正；还有的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了一步；有些则是提出了意见或假说，需要出土资料的证实。比如对“胶”和“胶鞮”的解释，“酱”“豉”在西北军队中的配给制度，酒类在军队中引起斗殴事件，汉简中记载的“马谋祝”礼俗，对“三颂”中若干名物的解释，都是子今的首发。在纠正以往不准确的认识方面，例子很多。如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士卒俑额头有一圈红色带状编织纹痕迹，发掘者称其为束发用的“陌额”，但子今通过对甘谷汉简“赤帻”的研究指出，这应该是“赤帻”而不是“陌额”。长沙东牌楼出土简牍有“蒋十五枚、蓆一束”“皮蓆一枚”的记载，整理者认为“‘蒋’应为‘浆’之通假”。但子今认为“‘蒋’应为‘蔣’”，《广雅·释器》：“蔣，蓆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蔣，通作‘蒋’。”显然，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字之差，两种事物。山西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拴驴泉发现正始五年（244）开凿石门、修治道路的石刻，其中有“作遍桥阁”一语。最初的整理者认为“‘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内凡须修造桥阁之处无一遗漏”。子今查看拓片发现，“作遍桥阁”应为“作徧桥阁”，“徧”即后世之“偏”，也是一种道路形式。居延汉简中的“慈其”，有学者认为，当是一种供人食用的蕨菜，但子今考证认为，“慈其”并非蕨类，而是一种供马畜食用的饲草。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往往奇思妙想，胜意迭出。被国家定为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就定名问题，学界有各种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直接取名为“紫燕骝”，子今认为最合理的名称应该是“天马”而不可称“紫燕骝”。这就把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所谓点燃的“人鱼膏”究属何物？按照子今的倾向，应该是鲸鱼油，但他并没有下断语，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鱼膏’之谜的彻底解开，地宫照明用燃料品质的最终认定，应当有待于依据考古工作收获的确切判断”。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提出一种科学假说，有待证明。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